● 马克思主义哲学

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范 燕 宁

(首都师范大学 政法系,北京 100037)

[作者简介] 范燕宁(1955-),女,辽宁北镇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摘 要] 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是当代“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于社会发展代价及其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特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不囿于当代西方发展代价观。但是,还应当对社会发展代价观的历史演化与当代形态、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代价的基本含义与实质、基本类型、产生根源以及认识的方法论等问题,系统地进行研究。

[关键词] 代价;社会发展代价;发展代价类型;发展代价补偿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661-08

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一种恒久而常新的社会矛盾现象,也是当代“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的快速发展态势,各种发展代价问题日益凸现,引起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和关注。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审视总结并进一步深化对于发展代价问题的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代价的基本含义与实质

“代价”(Prise, Cost)一词在不同的语义环境和不同的学科中具有不同的释义。在日常语言中,代价常指人为达到某种目的所作出的某种舍弃、付出、投入、消耗或牺牲。在经济学中代价被看做是生产成本、机会成本、成本投入(消耗)和“日常消费”;在社会学中,代价是指人决定其在社会生活中理性行为的个体性判断及选择标准。当人们在一种综合的意义上使用“代价”一词去进行历史发展的价值评判时,通常意义上的“代价”既表现为同时隶属于哲学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发展范畴——“社会发展代价”。

就哲学历史观的意义而言,“社会发展代价”的基本含义是表示“社会发展”与“代价”具有同时序性、相关性和密不可分性。这又具体体现在:(1)代价与社会发展目标密不可分。代价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对发展具有反省、刺激和推动过程的因素。它既有理由表明各种现存不合理事物的逐渐废弃以及一些新的发展形式的诞生,又具有使社会历史永不陷于停滞而继续追求新的发展目标的效果。因为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对发展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发展的命运、方向和目标。在一定意义上,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既是对某种发展目标的否定,同时又以否定的形式蕴涵着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发展就是通过扬弃代价而使各种合理目标不断否定、更替而加以实现的过程。(2)代价与社会发展方式密不可分。没有离开发展的代价,也没有离开代价的发展,代价是在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当中产生并且

是主体为换取某种进一步发展而做出的某种必要的牺牲。(3)代价与社会发展动力密不可分。社会进步与代价是社会发展进程内部本身所固有的一对重要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联结,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4)代价与社会发展成本密不可分。代价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发展所应“投入”的必要成本,投入的直接目的是“产出”,因而作为“投入”成本的代价是要换取作为“产出”的发展为目标的。(5)代价与社会发展风险密不可分。代价在没有出现之前,是作为某种风险存在于发展过程之中的,任何发展都具有一定的风险。风险的存在意味着既可以加速发展,又必然会付出代价,因而风险即包含着潜在的代价。代价与发展之间的诸多紧密联系决定了哲学历史观视野中的“代价”就是一种“发展的代价”,它既是人类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的客观结果,又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中介手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必然性与人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所进行的价值选择的辩证统一。

就哲学价值观的意义而言,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其实即是社会实践主体为实现自身长远发展目标而对诸多价值目标进行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所谓新时期中国的“社会发展代价”则表现为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社会实践主体为实现社会整体、快速、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对某些非主要发展目标有所放弃或牺牲的价值抉择。它具体表现为舍弃、付出与承受三种情况。

所谓舍弃,即是指实践主体为达到某些主要的、更加趋向于合理的新的发展目标而对一些非主要的、不尽合理的原有发展目标的否定与放弃。比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以否定长期以来我国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其原有的思维模式、管理机制及利益格局为代价的。

所谓付出,即是指实践主体为换取其主要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必须承担的“发展压力”或“社会成本”。比如,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一定会遇到一些阻力和风险。对于各种暂时不了解、不能决定的新困难、新问题,“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这里所谓“冒风险”、“要坚决地试”,都表明了改革必须有所付出,有所支付,但即使是付出一些代价也一定要坚决进行改革的决心。

所谓承受,既是指实践主体为推进其主要的、更加合理的发展目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而不得不加以正视的某些必然发生或不必然发生的、由客观必然因素造成的或由主观人为失误因素造成的、可以预料或不可预料的负面效应。它不是认识主体对社会发展现实中的消极的、非主流的、落后的、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消极的、无所作为的默认,而是采取各种积极的补救、调整、限制措施,尽可能将各种发展代价的负面效应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的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客观分析态度。比如,我国党和政府对改革深化发展时期所出现的工人下岗、道德滑坡、腐败及社会丑恶现象抬头等社会问题所采取的各种补救、调整、限制措施,就是对社会发展代价的积极承受态度的典型体现。

二、社会发展代价观的历史演化及其当代形态

早在 17 世纪,霍布斯就从人的利己本性(自我保存、趋利避害)和功利主义立场出发,论证过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付出的社会代价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程与资本家阶级的为富不仁、惟利是图的价值取向一样,都是人的“自然倾向”的表现,是天经地义的历史过程。18 世纪,卢梭又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出发,探讨了社会进步与社会道德沦丧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他认为,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天性善良,没有道德与善恶观念。然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天然善良本性反而日趋败坏,人的道德日趋堕落邪恶,特别是所有制的产生及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更使人的本性变坏。由此他指出,人的道德堕落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要恢复人的良心,使道德高尚起来,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按照社会契约建立起人人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这里,卢梭着重从人的本性出发揭示发展代价产生的根源,比霍布斯前进了一步。

黑格尔从“理性的狡计”和人的“恶欲”出发,解释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展”与“代价”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人类对自身利益和进步的追求会造成对某一正义、合理事物的否定,此亦可称之为“恶”。而这种恶既可以用来否定日趋衰亡的旧秩序,也可构成社会历史进步或发展的新的

推动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趋衰亡的、但为习惯所信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第237页)。不言而喻,黑格尔立足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和人的恶欲来揭示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与霍布斯、卢梭的发展代价思想相比,具有明显的辩证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以往社会历史观研究的积极成果和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从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角度出发,以物的世界“增殖”和人的世界“贬值”的关系上,具体地阐述了发展代价问题。首先,他们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及其建立和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他们用“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来概括评价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劳动者从封建束缚和行会控制下解放出来,大大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又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这一剥削制度,不仅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沦为物的奴隶,受物统治,而且把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变成了资本统治的社会,把人与人的一切关系变成物与物的金钱关系,把道德、良心、责任、爱情、信任、友谊等等一切人类高尚的社会情感异化为“金钱的交换物”。其次,他们基于人类社会自我否定的辩证矛盾运动,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付出代价的内在客观必然性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历史普遍性。马克思偏重于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手段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代价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必然以牺牲个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代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2](第4页)马克思也论述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付出代价的内在必然性,指出“人”类才能的发展必然“以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为代价,“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3](第124-125页)。“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4](第104页)。历史正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向前发展的。最后,他们还论述了发展与代价的得失辩证法以及对代价的正确态度。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世界的贬值是失,但以此却换取了“物”的世界的增殖,此即为得,这种“失”和“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和辩证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理论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既要坚持代价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承认“代价”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不能一味为付出的代价感到悲伤,又要应坚持代价问题上的历史辩证法,积极寻求扬弃代价的方法和途径,使代价趋于合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却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发展问题。对此,国外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从不同角度对发达工业社会及全球性的发展代价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首先,他们具体地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及其破坏性的负作用。当代国外“发展研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研究的着重点,是他们更多地关注环境、资源、人口等诸方面的代价问题。70年代初,当人们还沉湎于对经济增长的无限制追求,对资源性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无深刻察觉之时,罗马俱乐部就是一份“轰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直接向“经济无限制增长”的旧有观念提出了挑战,揭示了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缺乏、人口膨胀、社会邪恶上升和核威胁等给人类造成的困境。法国经济学家索瓦·佩鲁在其代表作《新的发展观》中对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片面实行“赶超发展战略”,只是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社会整体的综合协调发展,“结果是牺牲了老百姓的利益,并使他们对国外的依赖长期存在下去”的状况进行了批评,他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观”,力图以此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人为代价。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从技术异化的角度抨击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发展所付出的沉重的人的代价:科学技术在机器大工业中的应用使人成为机器的零件和“物的奴隶”;科学技术对人的奴役广泛地侵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造成了人的焦虑、不安、孤独、软弱等各种精神疾病,使人成为“单向度

的人”；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加剧了对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统治；科学技术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无限制开发和利用，使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其次，他们分析并揭示了代价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罗马俱乐部指出：从表面和直接的关系看来，发达工业社会的代价是由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和技术无政府主义应用所造成的，但从深层和本质的关系来看，则是由于人类本身的缺陷所造成的：一是人对自己行为的自我调节和控制技术的能力缺乏训练，人的调解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二是人的贪欲本性和人把自己作为征服自然界主人的文化价值观使人过分迷醉于技术的威力，放纵对自然的征服；三是对技术和技术专家的人道主义因素重视不够。索瓦·佩鲁指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是产生社会代价和人的代价的主要原因。法兰克福学派着重从技术统治方面寻求代价产生的原因，指出：发达工业化社会不仅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控制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还造就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技术控制的新形式加强了对人的奴役和控制，使人失去自己的生活自由和创造性。后现代主义者则从哲学深度上寻求代价产生的原因，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人是主体”、“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我设计的存在物”等种种理论，导致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付出巨大代价。最后，他们还着重探讨了扬弃代价以寻求再生之路的方法和途径。罗马俱乐部主张以经济和人口的“零增长”特别是通过“人的革命”来克服发展中的代价问题，以寻求再生之路。这里所谓“人的革命”，实质上讲的一是要挖掘人未曾使用过的潜力；二是克服人性中的缺陷，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的自我调控和自我组织能力；三是调整人的价值取向和活动重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本能革命”来扬弃发展代价，调整人的社会价值取向。总之，国外“发展研究”代价观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关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人类本性的缺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和“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着眼点，是人的本性和文化价值观，而不是社会制度问题。

三、近年来我国对于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深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现实社会发展矛盾的凸现，我国社会各方面对于社会发展代价问题日益关注，进行了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特征的深入探讨。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阐述了他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独特认识：（1）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引入对当前中国发展代价问题的认识，如实地指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产生各种发展代价的客观必然性。因为，改革开放是“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5]（第 206 页）。不仅要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要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观念。这样，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发展，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原有的利益关系和社会格局，“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带来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建立新体制，实现新政策也要冒一定的风险，这必然要带来和承担一定的发展代价。（2）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引入对发展代价问题的认识，提出了正确看待改革风险和发展代价的方法论原则。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则运用与对于中国现实发展问题的分析，指出，对于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6]（第 367-377 页），改革的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要有大的气魄，勇于改革，勇于实践，不要惧怕承担风险，但又要尽量减少风险；在改革中“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不应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害怕犯错误，但又“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6]（第 268 页），“要准备失败”，不要怕付出代价，不要怕犯错误，要相信“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6]（第 267 页）。但要及时总结经验，“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6]（第 288 页）。（3）将辩证法引入对当前中国发展代价问题的认识，指出对于改革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社会效应，必须加以积极引导和纠正，将其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决不能任其放任自流。他多

次告诫全党,“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5](第164页)。他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二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赖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6](第156页)。他还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他告诫全党,一定要努力工作,用“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6](第379页)。通过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效应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理论界由探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入手,逐步过渡到对发展代价问题进行探讨,并在党的十三大以后,逐步形成了对发展代价问题研究的高潮。与当代国外发展观关于发展代价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对于发展代价问题的研究具有新的不同特点:(1)研究的视角更加开阔。当代国外学者在研究发展代价问题时,往往侧重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方面的基本事实出发阐述对发展代价问题的基本认识,而中国学者在研究发展代价问题时,不仅注意到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现实的巨大矛盾冲突,而且对历史上的各种关于发展代价理论,特别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邓小平的发展代价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挖掘;对战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在科学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所产生的各种新的全球性发展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尤其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代价问题作了大量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深化了对发展代价问题研究和认识。(2)研究的层次更加深入。当代国外学者在阐述发展代价问题时,基本上还停留在一般性的层面上的问题研究,提出发展与代价之间的矛盾关系,注意从认识主体进行价值选择的角度阐述发展代价的客观必然性,而中国学者却紧密结合本国社会发展实际,对代价与发展、代价与风险、代价与成本、代价否定、发展代价与发展价值、发展代价与发展方式、发展代价与发展规律、发展代价与发展目标、发展代价的产生、表现、定义、种类、本质等许多相关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层性的理论探讨,使当代人类对于发展代价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价值论与历史观的统一。(3)确立了更加辩证、合理的发展代价观。我国学者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和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入探讨发展代价与发展实践的关系问题。从合理、适度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发展代价对社会发展的多重影响;区分了不可避免与可以避免的发展代价,必然付出的和主观因素造成的发展代价,并注意研究了社会、民众对代价的承受力、发展代价对群众利益的影响、发展代价与社会稳定及正常运行的关系,强调对代价问题要进行辩证思考,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也从理论上扩展了战后发展理论对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并为新时期党和政府制定与调整各种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四、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代价的基本类型和产生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发展代价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层面去研究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类型:若以承受代价的主体研究,可划分为个人代价、集体代价和社会代价;若以代价主体的实践活动方式研究,可划分为投入性代价、选择性代价、损益性代价和交易性代价;若以代价的损耗性质研究,可划分为精神代价和物质代价;若以代价的波及范围研究,可划分为整体性代价和局部性代价;若以代价的存在时间研究,可划分为长期代价和短期代价;等等。除上述的这些研究视角之外,从发展代价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价值的角度研究,可以划分为“必然性代价”和“人为性代价”两种类型。当前,着重分析研究这两种社会发展代价类型意义尤为重要。

所谓“必然性代价”是指与发展有内在必然联系并为换取某种发展所必然做出的牺牲和牺牲,其产

生具有内在客观依据: (1)从发展目标方面看:从应然角度讲,人们无疑应当追求全面发展的目标,但从实然角度看,由于历史条件和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不同历史阶段,人们事实上只能首先追求其中一种主导性的发展目标,而不能使其它目标在同等意义上同时得以实现。这就容易在形式上把某一目标的发展同其他发展目标割裂开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把主要精力、时间、条件、资源、力量和能量集中投入到这一目标的发展上,造成一种主导目标的发展要以排斥、抑制和牺牲其他目标的发展为代价的情况。在当前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个人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不尽完全一致的情况即是如此。

(2)从发展手段方面看:人们应当选择和采取综合的、理想的发展手段,但从现实角度看,由于历史条件和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却只能优先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主要的手段,这就会在外在形式上使人产生错觉,似乎一种手段的选择是以排斥或放弃其他手段为代价的。拜金主义思潮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盛行就属于这种情况。(3)从发展成本方面看:要发展必然需要有相应的成本投入,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当成本有限、投入不足从而满足不了发展的需要,有限的成本只能首先投入某种目标的发展而不能投入其他目标的发展时,就会付出与此相关的一定的发展代价。(4)从发展主体方面看:发展的承担者和实现者是人,人又是有利益矛盾的主体,人又分为个人、群体和人类,而且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个人群体人类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利益和矛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因社会全局加速发展的需要,而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短期利益受到较大损耗,一部分人需要为整体的发展付出较大代价,作出较大牺牲的情况。(5)从发展秩序方面看:发展必将改变既定的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也必将调整社会各阶层、各成员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当旧的社会秩序没有完全被打破而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会引发新旧秩序的不平衡和不同利益集团的人际矛盾冲突,以及社会成员在理想、信仰、道德等方面的价值观念的混乱和行为上的偏差,并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无序状态。

所谓“人为性代价”,是指与发展无必然和直接联系而由主观的历史局限和失误所造成的某种损失(俗称“交学费”)。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由整个认识主体的认识相对性和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发展代价。人们只能在其所能达到的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践和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条件达到什么程度,人的实践和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因此,就每一具体时期来讲,人们的价值选择可能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具有较为充分的客观依据。但就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而言,人们在每一具体历史时期的选择又往往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人们认识的这种相对性和历史局限性必然带来在判断、选择和实践行动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从而使人们的价值选择和实践活动要付出一定的发展代价。二是由某些具体个人的主观失误所造成的发展代价。就当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进程而言,这种发展代价主要有:(1)由政策不健全不规范造成的少数人损公肥私非法性活动所致。(2)由人治管理和法治不健全所滋生的权钱交易之腐败蔓延所致。(3)由于政治思想理论建设滞后,使部分党员干部思想素质低下所带来的邪恶上升和道德滑坡所致,等等。对上述由主观失误所造成的代价,要经过强化政治理论教育、抓紧党风建设和完善法制,是完全可以控制和避免的。

五、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方法论分析

目前,在如何看待发展代价的问题上,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有人对改革开放的艰难曲折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持理想主义的态度,面对改革求全责备,以偏概全,不愿承认发展必然付出代价的道理和现实;有人对发展代价的类型和根源缺乏了解和区分,片面地认为凡是发展代价都是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都是消极的,否认某些发展代价的合理性;有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路线,认为既然“发展是硬道理”,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那么就应当首先注重发展,不顾后果和代价,待有条件时再来解决代价问题,所谓先发展后治理。还有少数人习惯于落后的思维模式,出现的各种发展代价问题,忧虑重重,思旧怀旧,甚至对改革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这些认识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片面、主观、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各种发展代价问题,割裂发展

与代价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说明了深入开展对发展代价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目前在分析和研究发展代价问题时,应注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阐明几个问题:

其一,应坦率地承认社会发展代价的客观存在。既要历史地看到社会的进步,也要现实地看到社会发展所必然付出的一定代价。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全面地正确认识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以冷静坚毅和百倍努力的态度去积极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致像理想主义那样,抽象地看待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面对发展中的代价问题惊慌失措,消极责备。

其二,应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代价的作用。发展代价对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某些由人的主观失误所造成的代价,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消极的,但这类代价不能代表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主流。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整体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一定条件下,能够换取和补偿某种发展,它是以牺牲一种目标来换取某种更重要目标的实现。这是人在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补偿方面发挥主体自觉能动性的具体体现。科学地看待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有助于人们在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上,采取积极态度,避免付出过高的发展代价,可以把消极代价限制在最小限度。

第三,应具体地看待社会发展代价,注意区分代价的不同类型。任何发展过程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但并非所有在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都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历史普遍性。有许多发展代价是由人们的主观失误造成的,而不是“发展”必然带来的。就当前我国的情况而言,有些发展代价是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有些发展代价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有些发展代价是在我们工作重心转移和政策调整过程中产生的,有些发展代价是由人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因而,必须区分改革开放中必然付出的代价和工作失误所造成的代价,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借口各种代价问题的存在而怀疑、否定改革,更不能借口代价产生的必然性为人的主观失误开脱罪责。

第四,应注意用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发展代价。代价的产生和演化往往依一定的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当社会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目标、发展条件等因素发生转变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对发展过程中所出现出现的各种代价不应恐惧、悲伤,而应既从主观内因上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减少主观失误,又要看到“代价”存在的暂时性、变化性,确信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经过人们的多方面的努力,历史的发展会逐步消除或减少这些代价,而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的态度,对社会发展中的消极现象加以绝对化、片面化的看待。

第五,注意把握社会发展代价的“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发展必然付出代价,但发展代价的付出不应是任意的,而应被控制在科学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会抵消发展的积极成果。对发展代价的“度”的确定,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是:(1)社会及民众对代价的承受能力。许多方面的改革实践表明,发展代价如果被控制在一定的“度”内,普通民众尚可忍受,对发展就起积极影响。但如果超出一定的“度”,当事人就会感到不能忍受,会对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各项改革措施可能引起的社会代价,确定民众对于发展代价承受能力的“度”的界限和范围,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改革和发展对大多数人利益的维护程度,影响着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如果社会成员在改革中总的利益的获得多于付出,就会拥护改革,促进发展。反之,社会成员如果在改革中失去了原有的利益,发生实际利益的绝对下降,人们就会转而怀疑、否定改革,就会为发展造成阻力。所以,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有关改革的政策措施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3)对于发展代价的补偿和衔接问题。对发展代价的度的把握,不仅仅是对人们的利益损失多寡的控制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正常运行的保证问题。当社会发展代价被控制在一定的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时,社会的稳定与正常运行是有保障的,一定的发展代价的付出也是可以社会吸收、消解的,反之,如果超出这个限度,又未能得到及时调整,社会就可能出现种种不稳定因素。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在国家和集体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对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为社会整体发展作出了较大牺牲的部门及个人提供及时的“代价补偿”。

并为其提供新的获利机会和新的发展空间,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代价对社会成员的消极影响,及时吸收、化解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参 考 文 献

- [1]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3]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 II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4]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
-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严 真)

Price of Social Developments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alistic Analysis

FAN Yan-n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Biography: FAN Yan-ning (1955-), femal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pric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ety is a permanent and dilemmatic issue that human beings always run into, also that is one of the hot-points of the development studies of the da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of China to the world the various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ety have been raised and the extensive concerns about the problems on the pric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ety are caused in all quarters of China.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issue people have gone on many thoroughly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at not only reflect the spirit of the age and national traits, but also show many differences from some new western theories on the pric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goes deep into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theory points and characteristics among some studie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 of the pric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ety. Also the author gives a full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bout: The main idea and the essence of the pric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ety during China new period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world; The basic types and the sources of China social developments price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different methodolgy angles on studies about the pric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ociety of China at the present day.

Key words price; social development; types; add-up of developing price